

# 序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独立行政法人文化财研究所奈良文化财研究所以《三至六世纪中日古代遗迹出土文物比较研究》为题进行的为期四年(2002年4月1日~2006年3月10日)的合作研究已进入尾声,成果集中反映在这本论文集中,但又远不止如此。

公元三到六世纪是中国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随着秦汉帝国的解体,周围各地区各民族纷纷建立政权,并在大迁徙、大融合中不断创造出极富生气和特色的地域文化,加速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为隋唐帝国的建立和进一步繁荣准备了条件。地处东北亚南部的辽宁是这一时期多民族多文化活动比较频繁的一个地区,公孙氏、慕容鲜卑族和高句丽民族先后在此建立政权。他们所创造的文化既各有自身的渊源、文化发展序列、民族和区域特色及发展道路,又始终与中原王朝和汉文化保持着密切关系,从而为东北亚古代历史续写出光辉的篇章。已故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在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与“三模式”(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的系统论述中,把包括东北民族在内的北方地区诸民族在秦汉以后所走过的文明起源进程,称为“续生型”国家模式,其特点就在于他们也都经历了类似当地先秦时期的古国—方国—帝国的发展历程,而且是“骑马得天下,统治的是汉族人,继承的是汉文化,汉文化从此也长上翅膀,更有活力了。”从而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史上继续起到独特作用。

这一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也十分活跃,地处东北亚与欧亚草原接触地带的中国东北南部,是这一交流路线东端的一个枢纽,这一地区正在发生的历史变革和文化创新,随着东西文化交流的持续与延伸,也波及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从某种程度看,对后者的影响更值得深入研究。因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文明起源进程和国家的建立,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或成熟的。不同经济类型、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化之间的接触、碰撞、融合,以对先进文化的大幅度吸收为主流的相互影响,以至人群的迁移,成为包括日本列岛在内的东亚诸多民族跨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推动力。

为此,中日考古界都十分重视这一时期中国东北南部与日本列岛古文化的比较研究和新的考古资料的积累。其中辽西地区魏晋十六国时期以慕容鲜卑族为主创造的三燕文化,由于同日本古坟文化有许多相似甚至相同的文化因素,又是大家最为关注的一个课题。可喜的是,近年在慕容鲜卑族建国前后活动中心的辽西朝阳地区,对三燕

时期的墓地和遗址有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并连续取得系统材料。中日双方学者通过对朝阳三燕龙城城址、北票喇嘛洞三燕时期墓地等考古工地的实地考察和观摩出土文物，对三燕时期的一些代表性器类如金步摇冠饰、金属马具、带饰、甲冑和铁兵器、工具等，作了系列的类型学比较，对这些重要遗物的制作工艺进行了反复细致的观察和实验，对其所反映的埋葬制度、骑马文化特色有多角度的分析，对三燕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以及它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特别是对三燕文化与日本古坟文化之间的源与流关系、骑马文化传播的途径和方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样就使这次的合作研究，以前辈工作为基础，在某些中日双方共同关注的重大学术问题上有了较大深入，也为下一步的继续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课题。本文集收入的论文，绝大部分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在这次中日合作研究过程中，双方取长补短，相互尊重，相互学习，达到了共同提高的预期目的。参加这一合作研究的中国学者通过与日本学者的接触和对日本多处考古工地、已经展示开放的遗址和博物馆的考察，普遍感到，日本考古和文物博物馆界的同行们，不仅在考古研究上学风严谨，而且在考古资料的收集、高科技手段在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和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些成果和经验，对正在开展这方面工作的中国文物考古界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辽宁省的文物考古学者将会把这次中日合作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运用到今后的工作中去，进一步推动东亚地区的历史考古研究。

中国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郭大顺

中国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 长：王晶辰

2006年3月